DOI: 10.13815/j.cnki.jmtc(pss).2003.02.011

[文章编号]1003-6121（2003）02-0039-03

略述唐文化的兼容性

于 文 伟

（七台河职教中心，黑龙江 七台河 154600）

[摘要]唐文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，唐朝也因其兼容而强盛，这样的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值得借鉴。本文从产生原因，表现及其历史作用对唐文化的兼容性进行了探讨。

[关键词]文化交流；吸纳；融合；借鉴

[中图分类号]K203 [文献标识码]A

唐文化以其空前的繁荣散发着诱人的魅力。其中，以其兼容性最为突出。在改革开放、民族大团结、对外交流频繁的今天，重提唐文化的兼容性尤为重要。

一、唐文化兼容性产生的原因

唐文化的兼容性包括对东汉、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展，还包括对少数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吸纳和融合。这种兼容性并不是每个朝代的文化都具有的，为什么只有唐朝才具备呢？

首先，民族大融合是唐文化具有兼容性的首要因素。纵观历史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产生于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的过程中，并伴随这一过程得以深化和升华。春秋战国时期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。这一时期孕育了诸子百家，迎来了学术思想的百花齐放，带来了秦汉文化的繁荣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少数民族向内地迁徙与内地居民杂居，又形成了一次民族大融合的大好局面，各族文化相互吸引、融合，演绎了文化史上又一次繁荣景象。隋短暂的统一，使这种民族融合的成果得以总结与升华，唐朝正是处于这一历史趋势之中，因此，才有可能创造出一种具有兼容性特点的文化盛世。

其次，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士族门阀的势力，土地集中现象相对缓和，奴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，为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提供了条件。隋末农民战争使唐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了“民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[1]的道理，所以在政策上做了一些让步，施行了一些诸如“均田制”、“租庸调制”等措施，用于恢复生产并巩固统治。经过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，出现了“稻米流脂粟米白”经济大发展的局面。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，商业也随之飞速发展起来。唐封建经济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，这都奠定了唐文化高度发展的雄厚的物质基础。马克思、恩格斯曾说过：“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，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的发生变革。”[2]

再次，从唐初到天宝年间的“安史之乱”以前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，政治较为清明，从总的情况来看，国家是统一的，政治是安定的，这就为政府组织提供了条件。只有稳定的社会环境，政府才有可能重视文化的发展，并大规模地组织总结传统文化，发展本朝文化。如，唐朝以前，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，唐太宗开始设史馆，指定专人编修本国和前代国史，并令宰相编修。二十四史中，唐编修的就有八部。唐太宗还令颜师古订五经经文，撰成《五经正本》，又令孔颖达与诸儒撰《五经正义》。

第四，唐代文化的兼容性是在唐的开放性政策基础之上而形成的。唐代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，是胡化汉人所建立的政权，起于西北，胡化色彩较浓，受汉族的正统儒家思想的束缚较少。再加上魏晋时的越名教而任自然，摆脱礼教束缚，追求个性自由，放任不羁的余潮未息[3]，所以，他们在心理上可以容纳异族文化，使唐的政策少禁锢而开放有余。另外，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，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臻于完备，加上国力强盛，使唐的统治者们有极强的自信心，不怕外来文化将中华文化同化。

唐所采取的开放政策，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上，实行“自古帝王贵中华，贱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”[4]，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“抚育”和“柔服”的政策，对境外各国提出“柔怀”万国的政策，以“申辑睦，敦聘好。”[5]这些友好政策也贯穿于整个唐统治过程之中，从而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。唐派往国外的使臣、僧侣、商人不绝于途，当时与唐交好的主要国家达70多个。唐先进的各

[收稿日期]2002-12-16

种制度本身具有极强的吸引力，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又有引进中国文化的驱动力，这种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文化交流。各国纷纷派“遣唐使”来唐。唐为外国使者、商人和留学生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。如，国子监经唐太宗倡导，“添筑学馆一千二百间，增收中外生员，计八千余人，国学之盛，亘古未有。”[6]这无疑是唐与外国文化交流的最直接方式之一。

第五、唐文化具有兼容性与唐代发达的交通状况也紧密相关。唐境内陆路可通敦煌、西域、吐蕃、南诏、回纥等少数民族地区。水路也相当发达，大运河沟通南北，“天下诸津，舟航所聚，旁通巴、汉；前指闽越，七泽十薮，三江五湖，控引河洛，兼包淮海”[7]。对外交通也十分便利，西可达中亚、阿拉伯海、红海，南可达南洋诸岛、印度等国，东北可达朝鲜、日本等。便利的交通条件，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，促进了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。

二、唐文化兼容性表现

随着大量少数民族内迁与外域人就学、经商来中国，中外交流频繁，带来了唐文化形态上的碰撞和交融，唐政府实行了“兼容并包”的政策，使唐文化的兼容性充分显露出来。

首先，唐文化的兼容性表现为：并包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，滋补、充实、发展汉文化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唐代音乐就并包了周边少数民族音乐的优秀成分，是汉乐和胡乐融合结果。据杜佑的《通典》记载，唐太宗定乐十部，即清乐、西凉乐、龟兹乐、天竺乐、康国乐、疏勒乐、安国乐、高丽乐、礼毕乐和燕乐。其中除燕乐是唐自己创作的，清乐是南朝所传的旧乐外，其它八部均是文化交流的产物，均属胡乐。这种“胡乐”与“汉乐”的融合，标志着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与融合。这在历史文献中也有所记载，“开元二十四年，升胡部于堂上。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，若《凉州》、《伊州》、《甘州》之类。后又诏《道调》、《法曲》与胡部新声合作。”[8]西域的器乐如曲项琵琶、筚篥、龟兹琵琶都传入中原，为唐人所爱。舞蹈方面，如著名的《霓裳羽衣曲》，“本《婆罗本曲》，源出天竺，经过中亚，开元时传入中国。玄宗加以润色，易以美名，此乃胡乐与汉乐融合之结晶，为唐代音乐开放最富色泽之硕果……是一曲如幻如仙，富于浪漫色彩的美舞，代表了盛唐音乐舞蹈艺术的最高成就。”[9]在饮食和服饰上，唐的胡化倾向也很明显。向达先生总结说，“开元、天宝之际，长安胡化盛极一时。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：服饰、饮食、宫室、乐舞、绘画、竟事纷泊；其极社会各方面，隐约皆有所化，好之者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”。[10]服饰上，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载：“武德、贞观之时，宫人骑马者，依齐、隋旧制，多著，虽发自戎夷，而全身障蔽”，“永徽之后，皆用帷帽，拖裙到颈，渐为浅露。”[11]在饮食上，“开成六年正月六日，立春，命赐胡饼寺粥，时行胡饼，俗皆然。”

唐政府还允许形形色色的外国文化存在，以便吸收这些文化的优秀成份，丰富自己的文化，其吸收力和消化力都是前代未有的。以宗教为例，在唐代，因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，与唐朝皇帝同姓，所以皇帝们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，积极扶植道教，以道教为尊。在唐高祖武德八年下诏叙三教先后时：老先、次孔、末释，取得三教之首的地位，终唐一代。虽然如此，唐对其它宗教也不禁止，所以，唐出现了“三教合一”的局面。太宗在《慎所好》中就明白表示：“朕之所好者，惟在尧舜之道，周、孔之教。以为如鸟有翼、如鱼依水，失之必死，不可暂无也。”对于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也大力支持，使得佛教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，成为信徒最多、势力最大，影响最深的宗教。玄奘病重时，高宗“遣御医急赴，未至已卒，为之废朝数日。”还亲注《金刚经》，诏颁天下。

对于一些完全陌生的宗教，唐统治者也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，唐出现诸教并行的局面。如从波斯传入的祆教、摩尼教和景教，虽只有少数人信仰，但唐政府在长安、洛阳、武威、敦煌等地都设有祆教祠。唐政府中设有萨宝府，是专管祆教的机构；768 年（大历三年），唐代宗准许回纥在长安建摩尼教寺，并赐匾额“大云光明寺”。638 年，唐太宗下诏准许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在中国传教，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“建寺一所，度僧二十一人”。[12]

更加难能可贵的是，唐能够既吸收又消化，把它中国化，建立起具有自己特色和风格的中国文化。以雕塑为例，唐以前，塑像仿印度，个大、鼻高、清瘦，而且神情威严，线条劲健，望之森然可畏，使人难以接近。唐所造的塑像就有了中国人的风格，佛像庄严慈悲，衣服线条柔和，圆润，“无一不是参考现实世界中各种人物的躯体与性格。”[13]再以宗教为例，唐代以前的佛教基本上都是照搬印度的，但印度的原版佛教的教义十分晦涩、难懂，使得一般人不易接受。唐代以后，佛教的发展开始走自己的路，不再靠翻译印度的佛经，有了自己关于佛经的著作，尤其是唐后期，主要开始流行简单易懂的中国化佛经。绘画上也是如此，“画圣”吴道子，他运用的凹凸法使绘画有了立体感。他的绘画既有印度的风格，又有自己民族的特色。印度服饰是衣服紧贴，他的画却衣带宽松，看上去似乎会随风飘动，因而有“吴带当风”的美誉。

三、唐文化兼容性的历史作用

兼容性是中国盛唐时期的文化大汇聚的最显著特征。经过这场融合，唐文化给各民族文化带去了鲜活的气息。在南诏阁逻凤时，唐西泸县县令郑回被俘至南诏，后来被任为清平官，在南诏大力传播儒学。异牟寻和唐恢关系后，每年派贵族子弟到成都就学，前后延续五十年，学成回来的人“殆以数千”。汉族的诗人、书法家在南诏的文化修养得到了提高，开始向儒雅发展。再如，吐蕃在当时正处于奴隶制阶段。赞普松赞干布十分倾慕汉族的文明，多次遣使向唐求婚。641 年，文成公主入藏，带去了许多蔬菜种子、手工艺品、医疗器械、生产

工具以及各种书籍。后来，唐又派许多工匠人藏传授技术。松赞干布也不断派贵族子弟到长安求学。唐许多有学问的人也被聘请到吐蕃掌管文书。后来，《毛诗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文选》以及唐朝三大乐舞之一《秦王破阵乐》都传入吐蕃。唐与吐蕃的通婚和频繁的交往，不仅使吐蕃生产迅速发展，也提高了民族的文化素质。

唐文化兼容性的作用也向周边辐射。丰富的唐文化，随着交流传入朝鲜、日本。

与唐同时期的日本，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，在接触到中国先进的文化后，“对中国优秀文化益加叹羡和憧憬，朝野上下醉于模仿和学习，形成一股狂热的学习高潮。”[14]最直接的途径就是派“遣唐使”留学和学问僧。“这些留学生是学术专家、技术专家，他们把留学所得的新知识，应用于各个领域，对于日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艺术的提高起着显著的作用。”[15]日本在积极、主动、全面地学习中国先进文化的基础上，实行了以“唐为典范”的大化革新。仿效唐朝的典章文化制度，建立起与唐大体相同的官制；效仿唐朝的均田制，制订了班田收授法；仿唐国子监设立大学寮，并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列为必读书目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儒学、佛教、文学艺术、科学技术以及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大规模传入日本，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形成、发展和繁荣。当时中国东部的朝鲜正处于新罗时期，还较为落后，通过派遣使团和留学生，广泛地向唐学习，移植唐朝的国家体制和先进文化。政治上中央设省和部，地方上分九州五小京和郡县；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；文化上，在中央“立国学，置卿一人，”教授的课程有儒家经典、史书、文学、教学和科技等。

当时的唐朝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中转站，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后，经过中国的吸收、融合，再传往各地。对此木宫泰彦指出：“作为奈良朝文化根源的唐文化本身也不是单纯的唐文化，”它“还包括印度和西域等地的文化。”[16]在建筑艺术方面就有这样的例子。唐招提寺是鉴真和他的弟子设计修建的。日本《特别保护建筑物及国宝帐解说》中记载关于这个寺的金堂时说：“金堂是他和弟子如宝率领有缘施主修建的，是保存到今天最大最完美的天平时代的建筑物。”关于如宝的国籍，日本的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中说“胡人安如宝”，可见，应是西域人。[17]唐招提寺的金堂代表了当时唐朝最先进的建筑技术，但在这个技术中也包含了西域建筑艺术的优秀成分。

对于唐文化，日本当代史学家井上清颇为中肯地说：“唐代的文化是与印度、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，所以，学习了唐文化就间接地学习了世界文化。”只有具有了兼容性，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性文化，所以说，兼容性是唐文化的突出特点。

不仅是在当时，对后世唐文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20 世纪 30 年代，鲁迅先生曾说：“唐代的文化观念，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。那时我们的祖先，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强的把握，决不轻易地动摇他们的自信力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，决不轻易地崇拜和唾弃。这正是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态度。”[18]这种“兼容并包”的文化观念仍具有现实意义。

[参 考 文 献]

[1]新唐书. 三十八卷. 1975 年版. 172 页.

[2]马克思恩格斯选集. 第二卷. 154 页.

[3]李岩. 唐代文化的发展趋势. 三联出版社，1991 年版. 161 页.

[4]册府元龟 · 帝王部 · 来远. 1968 年版. 149 页.

[5]新唐书. 四十六卷. 礼部. 1975 年版. 236 页.

[6]唐语林. 卷五. 1975 年版. 384 页.

[7]旧唐书. 卷九十四. 崔融传. 中华书局，1975 年版. 2823 页.

[8]旧唐书 · 音乐二. 中华书局，1975 年版. 1413 页.

[9]王炎平. 唐代的开放与世风及国运关系. 贵州师大学报. 1992 年 2 月.

[10]向达.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. 河南大学出版社，86 页.

[11]姚汝能. 安禄山事迹:（下）.杭州师范学院学报. 1994 年 8 期.

[12]唐会要. 卷四十九. 大秦寺. 1982 年版. 468 页.

[13]范文澜. 中国通史. 1989 年版. 124 页.

[14]孙项军译. 日本高僧传 · 要文抄.

[15]木宫泰彦. 日中文化交流史.

[16]扶桑略记.

[17]头陀亲王入唐略记.

[18]孙伏园. 鲁迅先生二三事 · 杨贵妃. 46 页.

[作者简介]于文伟，七台河职教中心，教师。

[责任编辑]李献英